

近代史論集

范啓龍 著



近代史論集

范啓龍 著

近代史論集

范啓龍 著

著作人：范啓龍

發行人：范啓龍

住址：福建福州市倉山陽光新村7-403號

電話：(591) 3465683

電腦打字：統一照相打字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台北市西園路二段261巷15號

電話：(02) 2301-6512

傳真：(02) 2301-6513

印刷裝訂：翰鈺印刷興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1194巷20號2樓

電話：(02) 2225-1716 傳真：(02) 2226-0393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王 序

范啟龍教授的論文集將在台灣出版了，他告訴我這個消息，並要我寫幾句話。我近幾年身體不好，現在美國休養，但我得知這件事後，非常高興，寫點感想，義不容辭。

我認識范兄已多年了，我記得他與我同庚，他是邵循正先生的高足，邵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輩，在世時對我指導、關照很多，因而我與范兄之間除了同行以外，無形中似乎又有同門的友誼。1979年在南京舉辦了中國首次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國際討論會——太平天國史國際討論會，他參加了會議，提供了一篇出色的論文《太平天國南方餘部在閩粵的戰鬥》。終十年後，在廣東茂名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上，他又提交了一篇關於太平天國與近代化關係的論文，很富新意。這是兩次我們同參加的學術會議。可能不止這些，單憑回憶，有的已記不真切了。總之，自1979年以後，我們有了更多的工作來往，使我進一步了解范兄的確是勤懇樸實，學養深厚的學者。

從他寄給我的論文集目錄來看，我們一起參加過討論的上述兩篇，已編入了，編入的還有關於辛亥革命，關於華僑、關於台灣、關於福建地方的歷史、人物如林則徐、嚴復、陳寶琛等各方面專題的論文，大體上以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為主，又在在與地方史密切相連。范兄以福建人在福建高等學校執教數十年，所研究者自鴉片戰爭至民國，但根基不離福建，可謂研究歷史，不忘鄉梓，對中國近代史，對福建地方史作出了卓越的成績。

范兄告訴我，40多年來他已發表近百篇文章，選入論文集的自然只能是少數，而且都是1979年以後的作品，這反映了范兄和我這樣年齡的人所經歷的歷史，中國近代史在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受到了極大的重視，是學校裡和社會上普遍學習、關注的課程。但從學術研究來看，似乎並沒有走上正確的軌道。我在大學不是學歷史的，工作後

對歷史有深厚興趣而成為愛好者，業餘研究者，後來才成為歷史專業人員。我的體會是，那時對客觀研究的認識很差，似乎只須重複「真理」使之適應現實需要就行。這導致了「文革」時期歪曲歷史的種種荒謬議論，而真正的科學研究被排斥了，被扼殺了。1978年時，近代史研究所曾調查統計1949-1978年間國內國外對中國近代史的文章和書籍，我記得，以國內而論，真是少而薄弱。在「文革」結束以後，在那以後，我們大家對過去的時期漸漸有了清醒的認識，對如何作科學研究漸漸有了較正確的認識，北京一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朋友在1978年組成了一個名為「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的學術團體，這是當時最早的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團體，對於認真的歷史研究起了一些促進作用。它發起、組織上述太平天國史的國際討論會，范兄關於南方太平軍的戰鬥一文，在「文革」時代的浮誇學風之後，帶來了比較切實的氣氛，它的擴充篇後來又發表在北京太平天國研究會主辦的《太平天國學刊》上，受到當時與會者和讀者的好評。我理解，這二十年，是中國歷史研究者走上新道路的開始。現在，范兄將他的主要成果作一結集，反映出他二十年來的成就，我為他祝賀，並希望未來會促使學術和出版更加繁榮。

王慶成

1999年12月15日

張 序

得悉范啟龍教授的中國近代史論文集付梓，深感欣慰。

時光流逝，啟龍兄和我相識業已 40 餘年。50 年代後期，他到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師從我的導師邵循正先生，所以誼屬同窗。他較我大幾歲，自是學長。1958 年畢業後，我分配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粵閩毗鄰，交往卻並不多。好在我們同治中國近代史，在學術研究會上得以晤面，此外，就是閱讀彼此發表的論文。在長期的接觸中，啟龍兄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是：謙虛慎重，治學嚴謹，工作認真，樸實無華。他那種力避浮燥、「不求聞達」的品格，令我欽敬。因為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畢生獻身於高教事業，40 餘年培育了無數人才；同時，在繁重的教學活動之餘撰寫了近百篇論著。他的生活是清苦的——正如大多數知識份子一樣。

啟龍兄的研究工作涉獵頗廣，幾乎涵蓋了中國近代史領域中的大部份重要事件，其中，又側重於政治史和文化史。顯然，這與他的教學業務有關。他的許多文章均帶有濃郁的地方特色，發生在他的故鄉福建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備受關注。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則是他論著中的主要課題，而作者的視角往往仍置於桑梓。

文如其人。啟龍兄的著述的優長是鮮明的。他非常重視對史料的廣泛搜集和認真審查，充分利用可靠的、典型的史料，因為他完全懂得史實基礎，使他的論述具備了科學性的前提。當然，立論中肯，言之成理，不僅必須持之有故，更需要正確理論、方法論的指導。歸根結蒂，歷史科學的主要任務不能侷囿於史料的排比和史實的疏理，還應當作出分析、判斷和評價，以揭示不同領域和層次的規律，從而，起到以史為鑑的作用。因之，啟龍兄頗為重視正確理論、方法論的引導。他的著述貫串著實事求是的準則，體現了利於反映歷史真實的多元方法論。樸實明曉，不乏創見，這是我對啟龍兄的著述的基本觀

感。他對中國近代史、福建地方史的研究卓有成績，功不可沒。

啟龍兄長我數歲，年逾古稀。我祝願他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成果豐碩。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有這樣一種共識——懷有崇高的理想，鋌而不舍地勞作，肩負著時代的責任感與義務感，就不會感到「老之將至」。生命的真諦，無疑在於奉獻！

讓我們共勉吧！

張 磊

2000年春於廣州

自序

這本集子是本人在福建高師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科研工作 40 餘年，主要是改革開放以來 20 年的寫作選集。它除了涉及一般的中國近代史問題外，著重於福建近代史方面。因為我生長、學習、工作在福建家鄉，在北京大學歷史系進修時的指導老師邵循正教授也是福建老鄉，他鼓勵我就地取材，多鑽研家鄉近代史方面的問題。

中國近代史是舊中國落後挨打的歷史。它沉痛地記述了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勾結國內封建勢力得寸進尺地侵略，把我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程，也記敘著中國各族人民不甘壓迫而不斷摸索、奮進，不屈不撓地進行反帝反封建英勇鬥爭，奪取革命勝利的經過。它既令人深感屈辱和痛苦，又促使人們覺醒和振奮。在這段時期中雖然出現過少量的懦夫、可憐蟲，而一批又一批前赴後繼的革命勇士的大無畏精神卻始終煥發鼓舞和帶領人民群眾奮鬥不息，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刻苦耐勞，勤奮勇敢，疾惡如仇，既敢於鬥爭也善於鬥爭的事實。它是多麼豐富充實、有血有肉和多姿多彩，確是一部愛國主義教育的好教材。在五、六十年代，高師強調以教學為主，且受統一的教學大綱和示範教材的束縛，談不上什麼創新和獨立思考，科研工作基本沒有開展。10 多年間積累的不少資料，又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遭受散失。改革開放以來，思想解放了，師生們都插上了翅膀，可任意翱翔，在課堂內外相互切磋討論，尋找和發現問題並爭取加以解決。我們為了弄通教學上遇到的疑難之處，必須深入地鑽研和思考，便有了科研寫作的必要。因此，我的大量勞動成果便出現在 70 年代末以後，這是適應時代需要的結果。

在教學過程中，為了補充和增加鄉土教材，必然要多考慮與本地區有關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問題，而近代史上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是兩個重大的歷史大事，為此，我便投入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搜集有

關資料，進行細緻的考訂和分析，以求符合客觀實際；對一批歷史人物也應該進行探索瞭解；香港、澳門的陸續回歸，徹底洗雪了百餘年來的恥辱，是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理應提筆慶賀。於是便有了這批習作問世。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北大歷史系進修時，邵循正教授給了全面的業務指導，陳慶華師兄和張寄謙師姐又給我許多幫助，還有同時在邵先生門下受業的研究生張磊等七位學友也經常互相切磋，毫無保留地協助，這就為我打下了較為堅實的基礎，能夠長期勝任崗位工作。在工作過程中，與我大學同校同專業畢業的老伴許碧球不僅在日常生活上給我數十年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而且還常擠出自己在中學教學中的寶貴時間，為我核對資料，每次都成為最早的忠實讀者。認真提出修改意見，有時還親手為我抄正。1999年10月下旬，我們原福建省立長汀中學高中畢業已半個多世紀的部分老同學重返母校，團聚敘舊，從台灣回來的廖家齊、鄭健（朝森）兩位學長極重同窗情誼，得知我離休7年後仍筆耕不輟，且手頭積累著頗豐厚的已發表的論文時，立即表示要聯合賴光臨、李時羨等同學在台代為結集出版，他們並即著手進行，在此我對他們深致衷心的謝意。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太平天國史專家王慶成學長正在美國探親養病，廣東社會科學院院長、辛亥革命史和孫中山研究專家張磊學長工作十分忙碌，當他們得知此事後，以同門之誼，馬上帶病或在百忙中執筆為這本小書作序，我深為感謝。他們的大力支持，都將鼓勵我在古稀之年繼續思索鑽研和奮進，為史學事業添磚加瓦。但是，由於個人水平有限，本書難免存在不足之處，敬請讀者和專家學者們給予批評指正。

范啓龍

2000年元宵節

於福建師大陽光新村

近代史論集

王序	1
張序	3
自序	5

目 錄

太平軍四次入閩戰鬥及福建人民的反清鬥爭	1
太平天國起義不能實施近代化	61
福建辛亥風雲	69
辛亥革命前後的福建	87
清末海軍與辛亥革命	
——兼論蔭鎮冰對革命的態度	135
福建華僑與辛亥革命	147
辛亥革命在汀江流域	159
港澳台與辛亥革命	169
辛亥革命時期台灣人民要求回歸祖國的抗日鬥爭	179
洗雪百年國恥 迎接香港回歸	195
洗盡殖民歷史 歡慶澳門回歸	205
「清流派」陳寶琛與中法戰爭	225

試論「台灣民主國」和台灣人民的反割台鬥爭·····	237
《天演論》的譯著及其偉大影響·····	247
略論林則徐愛國思想的特點·····	255
林覺民·····	261
方聲洞·····	267
方君瑛·····	271
學貫中西的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	275
陳寶琛史事四則·····	281
陳寶琛在福建·····	287
南下護法國會議員雷煥猷·····	291
近代閩籍文學家、教育家江瀚·····	295
中國近代司法界泰斗江庸·····	297
陳兆鏞·····	303
關於五口開埠通商的日期·····	307
蕭文遺稿《大埔、永定、上杭的光復和革命軍在長汀的失敗》 文中有關福建史實的問題·····	311

太平軍四次入閩戰鬥及 福建人民的反清鬥爭

本文原載于《太平天國學刊》第四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出版。其第四次入閩部分曾以《太平天國南方餘部在閩粵的戰鬥》為題，作為參加1979年5月25日至6月2日由北京太平天國歷史研究會和南京史學會在南京聯合召開的「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的論文，會後被收入《太平天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中華書局1981年10月出版。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中國人民便從此擔負起了反封建和反侵略的雙重革命任務。1851年爆發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便是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太平天國初期的勝利進軍和隨後的北伐、西征。鼓舞了人民群眾，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包括少數民族地區）都紛紛掀起響應太平天國革命的反清鬥爭。形成了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在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福建人民也進行了十餘年的武裝鬥爭。太平軍曾經四次入閩。福建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配合太平軍給予反動勢力以沉重的打擊。福建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是近代中國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一個組成部分。史學界已有人分別探討過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福建的林俊起義和閩南小刀會起義。本文根據個人所接觸的史料，試圖對太平軍四次入閩前後福建的革命形勢作比較全面的考察，提出初步的看法。由於受業務水平和理論水平的限制，不當之處請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清王朝統治下的福建社會狀況

在清王朝黑暗統治下，福建的土地相當集中，除掉屬於官田性質的屯田、灶地之外，多數是地主私人占有的「民田」。寺院所占的僧田為數也不少。此外，又有所謂義田、祠田、族田、廟田、學田、茶田等屬於鄉族的共有地。這些土地實際上都是控制在靠剝削為生的地主階級手裡。真

正從事生產的農民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一些土地。而且農民為數很少的一部分土地，也還要不斷地遭到地主豪紳的兼併。

鴉片戰爭以前，甚至在戰後的一段時間裡，福建廣大農村仍然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控制。「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他們必需在農閑時候從事紡織等副業勞動，才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馬克思曾經在《對華貿易》一文中引用過1852年廣州英國代辦米淇爾的報告，他說：「福建的農民不僅是一個農民，他是莊稼漢又兼小手工業者。他生產這樣的布疋，除原料的成本外，簡直不費分文。如前所說，他是在自己的家裡，經自己的妻子和農業雇工的手而生產這樣布疋的；既不要額外的勞力，又不費特別的時間。在他的莊稼正在生長時，在收穫完畢以後，以及在雨天不能外出工作的日子裡，他就使他手下的人們紡紗織布。總之，一年到頭一有可利用的空餘時間，這個家庭工業的雛形總是去生產一些有用的東西。」⁽¹⁾但是，福建農民雖然十分刻苦耐勞。仍然過著非常貧困的生活。他們為了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耕作權，被迫支出高額的佃租，而一般都是繳納實物。除谷米外，也可交其他東西。如閩北三元梅列的麥地，便有以魚、布繳納佃租的。⁽²⁾麥地收納租布，正反映了耕織合一的自然經濟的特點。福建農村的地租，通常都占收穫物的五成，有的則三七對分，如閩西寧化縣便有其例：「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農民佃其田，終歲勤動，獲止三分，籽種耨獲之費在其中」。⁽³⁾據傳說，永安一帶還有二八分租的惡例。⁽⁴⁾不僅如此，農民必須對地主負擔許多封建的貢納和勞役。據傅衣凌教授在《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中所提供的許多契據材料來看：在道光以前，閩西北的寧化、清流、明溪、永安、沙縣、三元、尤溪、閩清等縣農民，除了輪租之外。契約上還規定有交一定數量冬牲、食牲的苛例。冬牲是雞、鴨之類，但也可用穀、豆或錢等折納；食牲大約指豬。道光以後，又將冬牲合併在正租裡面。此外，佃農還須繳納其他副產物，如寧化縣有交豆粿的；柘榮縣有獻薯絲的；三元的梅列則加收綠豆；閩侯縣佃池者除繳池租外，還得向地主送魚；南安縣有「飯餐」的習慣，地主收租時，農民得備辦豐滿酒席招待；當地主回家時。還得外加田頭雞或鴨（俗名田儀雞）。在福建西北部舊延平、建寧、邵武等府屬，佃農又有為地主擔負無償勞役的義務。⁽⁵⁾

地主階級在農村殘酷的經濟剝削，迫使農民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借債

度日，債權人利用青黃不接的時機，索取更高的利率。據嘉慶朝刑部案件中十七件有關福建借貸利率件數的統計，其中利率在一分以上者兩件，二分以上者三件，三分以上者九件。⁽⁶⁾可見多數都是偏高的。傅衣凌教授曾就所掌握的清代福建契約進行分析，不但發現借錢還穀的規定，而且農民往往還要以自己僅有的一些田地作為抵押品，向高利貸者典當。農民雖然抱著還要贖回的願望，但常常愈陷愈深，經過幾回的典當而找盡，終於失去了土地。福建農村地權的轉移，多是先經過典當而後達到賣斷階段的。這種先典後賣，對於農民正反映了他們跟土地不可分割的關係；對於買主卻是一項有利的手段，所以他們都樂於採用這種方式來盤剝農民和積聚田產。這也可以看出高利貸資本在農村中所起的侵蝕作用。

地主和高利貸者，加上維護他們利益的封建官吏，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他們對農民進行著殘酷的壓榨，瘋狂地兼並土地，驅使越來越多的自耕農和半自耕農轉落到佃農的地位。這些剝削者往往還不以掠奪農民土地為己有而滿足，更逼使農民負擔「田賣稅存之累」。陳瓚在《條陳古田編審事宜十議》中，曾談到康熙年間古田縣的這種情況：「大凡有稅無田之戶，由於己之以短畝賣田，而短畝賣田，由於財主之乘急逼勒。」⁽⁷⁾這不僅是一時一地的例子，直到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泉州一帶，仍然存在這種極不合理的惡例。沈儲《舌擊編》說：泉州府屬「民間田糧，歷多詭寄津貼，有田者無糧，有糧者無田，真正欠戶，無從查追。兼之冊籍混淆，每年征收惟圖承是賴，因之叢為利藪，無弊不生。」⁽⁸⁾

鴉片戰爭以後，清王朝吏治十分腐敗，官場上賄賂公行，一批封疆大員貪污無能，沈湎於酒色之中。如閩浙總督慶端「係公子出身，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聽；又恐屬員藐視，每每以虛情之氣輟轡僚屬」。他經常「一經入席，惟恐人之不醉，又惟恐己之不醉，不能觀人之大醉也。沉醉後，僅止圍棋射鵰，吹笛狂歌，……最可怕者，兩眼麻沙，雙跌彳亍，欲賭馬射，以示豪強」。而且「與屬員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福建巡撫瑞璜「庸碌無能，……又知正軒（慶端）脾氣，故公事從不作主，一遵教令」。布政使裕鐸「亦爛醉如泥，與慶制軍高聲互唱」。他們「無不與官常交結，因緣為奸」。⁽⁹⁾又如前任閩浙總督顏伯燾，因鴉片戰爭時廈門之敗，獲罪革職後回廣東原籍，途經漳州時，擔任汀漳龍道的張集馨親見其扛夫搬運箱籠什物過境，每日總在六七百名，一連十天才過完。隨行的「兵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

幾三千名，……酒席上下共用四百餘桌」。一住五天，顏伯燾找出各種藉口賴著不走，仍希望道光皇帝會下命令讓他留在福建「會辦夷務」。龍溪縣蔣令深感「縣中供應實不能支」，但表面上還得請求顏伯燾多住幾天，背後卻賄賂顏的親信黃守備，「用以法術」，才送走這個瘟神，五天內，「實用去一萬餘金」。顏伯燾臨走時下轎跟張集馨耳語說：「如有佳音，幸即專人送粵」。還念念不忘道光給他革職留用的上諭。張集馨當時「立于道旁，見大小轎十餘乘，每轎皆夫四名，轎前則戈什哈引馬，轎旁則兵役八名，每轎皆然，雖僕婦使女之輿，未嘗不然。及入城，見一懋賴粗役，亦坐四人肩輿。又見竹杠上抬一粗黑水瓮，兩條粗木板凳，不知帶去何用，無怪用夫之多也！」¹⁰⁰清政府的腐敗還表現在公開進行賣官鬻爵，「福建票本例開，佐雜微員、積年劣幕，皆捐升道府廳縣，其流品直不可考核。」¹⁰¹他們的官職是花錢買來的，就任以後必然急於追本求利，加緊勒索，勞動人民因而深受其害。由於政由賄成，群眾也受影響，往往「民間命案，多半賄和，被害家若已得資，雖凶犯逍遙于市，屍屬不復過回」。¹⁰²難怪張集馨慨嘆：「民風吏治，別有地天」；「吏治之壞，至閩極矣」。

¹⁰³

福建的清軍十分衰敗，不但沒有什麼戰鬥力，而且兵匪相通，為害社會。如南平一帶「劫案累累，勇且為盜，是以百姓之脂膏，餒養許多之豹虎」。¹⁰⁴漳州府屬的「水師與洋盜，是一是二，其父為洋盜，其子為水師，是所恆有。水師兵丁，誤差革退，即去而為洋盜；營中招募水師兵丁，洋盜即來入伍，誠以沙線海潮，非熟悉情形者不能充補」。¹⁰⁵順昌一帶的土匪，名義上已經歸順，實際上繼續勾結匪類，出營搶劫。他們甚至「截留省糧，私立厘卡，飛揚跋扈，大有綠林豪傑舉動」。¹⁰⁶當時，「閩省風俗，強凌弱，眾暴寡，村居里處，每每被人蹂躪。……是以稍為溫飽者，必謀入營」，他們又「不能承應差使，則雇窮人頂充」，因此，鎮、協、參、游「所帶各兵，皆係立時招雇，烏合閑人，不知紀律，營員亦不敢繩之以法，恐其嘩散，及至臨敵，見賊先奔」。所以張集馨慨嘆：「營制之壞，至閩極矣」。¹⁰⁷

福建的財政也搞得一團糟，他們「上下因循，縱玩日久」，積重難返。「將軍衙門常稅都不足額，全仗夷稅津貼。閩省丁耗征解無幾，亦仗此夷稅以充軍餉，每年總在五六十萬。」¹⁰⁸「各州縣欠解茶稅，盈千累萬，屢催不解。稅契更成各屬陋規，捐輸亦復挪用，厘金任意浮開，以多

報少」。招兵募勇也成了地方官撈取金錢的一種手段，因為「募勇最難稽考，道府州縣中之不肖者，皆以此為利藪」。^①當時旗兵和綠營的營米，由糧道衙門負責，由於丁耗米糧多半調緩，只得買米支放，可又「無款可籌，遂將司庫給發米折逐月挪用，以致虧欠各營米折甚多。……三任共挪用十萬零四百兩」。^②鹽務也十分混亂，鹽販們「皆係漳、泉、興、永各村無賴，並無一定頭目，……約其抗官，則同心戮力，約其納課，則築室道謀」。因此，「額引四十餘萬，倒蓬缺額者已居其半」。而且「自盜賊充斥，……鹽課大減」，「鹽務毫無起色」。^③錢局的「弊竇極多」，當年「福建錢局名曰『寶福』，由制錢改鑄大錢，由大錢改鑄鐵錢，復由鐵錢改鑄制錢」，每改一次，含銅的成色就下降一次。^④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大的福建農民已經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地主豪紳們絲毫也不會憐惜。他們為了實現私人爭權奪利的野心，還利用封建的宗族觀念，發動農民進行械鬥，把強壯的全勞力驅往無謂的鬥武場所。「內地漳、泉、興、永、民風蠻悍，械鬥習以為常，數百年來鬥風未熄。建、延、汀、邵、跬步皆山，盜賊淵藪」。^⑤人們械鬥時「大姓則立紅旗，小姓則植白旗，擄人勒贖，糾眾殘殺」。他們「訂日互鬥，大姓則合族相幫，小姓則合幫相助，本村壯丁不足，則於外間招募，總以必死為能。凡出門者，妻孥喜笑相送，不望生還。或父子二人，父受大姓雇募，子受小姓雇募，及至臨場，父子各忠所事，若不相識」。^⑥那些為民「父母」的地方官不僅不設法從中化解或秉公處理，反而抱著幸災樂禍的心理以坐收漁人之利，忍看生民塗炭。「漳州城外不數里，即聞槍炮聲，聽其相鬥而已」。道光年間建寧人張際亮便曾指出福建貪官污吏不惜民命的事實，他說道：「借問閩官吏，幾恤民生死？官貪民乃鬥，民鬥官乃喜」。^⑦由於官吏從中作祟，械鬥的規模越鬧越大。又因根本問題未獲解決，往往循環報復不已。這種毫無意義的互鬥，不管任何一方勝敗，對於生產都會帶來巨大的損失。自福州開埠通商以後，廣東人到福建的不少，那時「南台距省十五里，華夷雜沓，商賈輻湊。最為閩省繁富之地，亦最為閩省禍亂之區。」外國侵略者便乘機挑撥閩、粵兩省人民之間的矛盾。因夷人與廣人素相熟悉……若廣人與漳泉人爭競，夷人又袒護廣人，而漳、泉人不能心服，尋釁爭競，互有殺傷。上年（1859年）閩、粵哄爭，夷人借炮與廣人，助其兇鬥」。^⑧侵略者鼓動中國人民械鬥，以便從中漁利。

鴉片戰爭後，在五口通商中福建被迫開放了福州、廈門二口。從

此，外國商品源源輸入。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國強盜「用武力奪得了五大商港中的自由貿易權，千百隻英國和美國的輪船開到了中國去，而在很快的時期內，中國市場上就被充滿了英國和美國的便宜的機器製造品。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中國農業，競爭不過機器工業，於是穩固的中國就遇到了社會危機」。⁹⁷首當其衝的五口及其附近地區，便出現了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的現象。英美商人大量輸入機器製造的洋紗洋布，來打擊和排擠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廈門本是福建手工棉織品的主要集散中心，「向來在廈商人，將本省漳州府屬及同安縣土產之棉布等物，由海道運至寧波、乍浦、上海、天津、錦州、蓋平及台灣鹿港一帶銷售，復在寧波等處販買江浙之棉布及各種貨物至廈門售賣，其各省商船之來廈者亦如此輾轉行運」。⁹⁸自1843年11月2日廈門開市之後，在不滿一年半的時間內，上述情況就起了明顯的變化。洋布、洋棉「充積於廈門」，「其質既美，其價復廉」，土布、土棉便遭到嚴重的打擊。「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⁹⁹雖然這種情形還只是開始在福、廈二口及其附近地區出現，它卻是根深蒂固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即將解體的徵兆。

伴隨著外國商船和洋貨的進口，福建的帆船航運業也遭到排擠摧殘。據道光《廈門志》所載：當時福建沿海航行的船只有三種：一為橫渡台灣配運兵穀的「橫洋船」，一為北上至江浙及華北、東北貿易的北槽船，一為南下至廣東各地貿易的南槽船。除南北槽船之外，橫洋船的數目約為一千隻，¹⁰⁰若以「每船平均一百五十噸計算，福建海船的載重量最低估計亦在十五萬噸左右」。¹⁰¹從此也可以推知福建沿海靠船運為生者的衆多了。五口開埠通商以後，外國船鼓輪進口，就廈門一地來看，「今自夷人來廈開市，凡洋貨皆係夷商自行轉運，閩省並無赴粵之商，粵省亦鮮來閩之賈。且該夷除販運洋貨外，兼運洋布、洋棉，其物充積於廈口」。¹⁰²據田汝康先生分析，外國侵略者通過拒絕保險，強迫「護航」和外船享有稅率特權等三種方式來摧殘中國帆船業，¹⁰³迫使中國沿海帆船運輸迅速衰落，從而使「閩省廈門之物資，則只能售于本省，不能旁及他方」。¹⁰⁴到了戰後，福建渡台的橫洋船很快就從千餘隻降到四五十隻了。¹⁰⁵於是，大批靠航海為生的舊式運輸工人便宣告失業。

戰後不僅西洋機器製品源源進口，鴉片輸入的數量也比戰前更為直